

“你不可不知的长征知识”：

六次重要会议挽救党和红军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扎西会议会址。(资料图片)

通道会议：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

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黎平会议：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

猴场会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

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旧址全貌。(资料图片)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古代放休假制度

空余的时间是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基本前提。就如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法定节假日一样,古代也有类似完善的休假制度。古代的官方休假时间可分为三类:一是各种节日,如一些传统的宗教、祭祀和民俗类节日;二是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临时性假日。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放休假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官僚阶层,且并没有被严格执行。

节假日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夏至、伏日、中秋节、腊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如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文帝时期,汉代放一天假,唐代放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假。民间认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所以只能放假休息。冬至是阴阳二气转换的时节,要以静养为主,“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也要放假休息。

法定假日

官员的法定作息制度称为“休沐”,这一制度起源于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沐,最早的意思是洗头髮,后来泛指洗浴、洗涤,这里指代的是休息。唐代把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休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驰驱一日闲”,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天,这三天分别叫作上浣、中浣、下浣。为何唐代较之汉代假日有所减少?因为汉代官员一般住在官署内,而不是住在家里,办公时间就比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

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后,官员一般就住在家 里,来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时间也随之减少。

临时假日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诞辰,也会放假几天,以示庆祝。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放假三天。此后的帝王多沿袭这种做法,在生日时给官民放假。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诞辰称为“降圣节”,放假一天。还有一些忌日,也是上下“废务”,不上班。家庭成员中,近亲的婚丧,官方规定可以回家休假。如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去职,服丧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离开父母三千里之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上的时间),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儿子行冠礼(即成年礼),有三天假期;儿女婚礼,有九天假期;受业老师去世,有三天假期等。

星期制的引入

随着近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中国人注意到了西方的星期制。

1902年,清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星期制,之后星期制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作息制度。星期制的引入,更为重要的意义是

扎西会议：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

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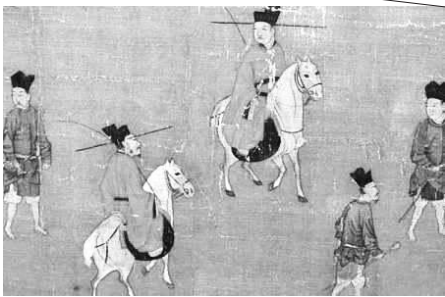
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苟坝会议：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据人民网)



(资料图片)

改变了中国人,尤其是劳动阶层的生活观念。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技术和工具落后,农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由此也逐渐形成了多劳动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劳一直被视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纯粹的娱乐消遣,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现代作息观念让普通人意识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重要性,通过休闲娱乐来恢复体力和精力,从而让工作更有效率。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虽然投入了很多时间去工作,但效率反而不如善于休息的西方人,梁启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是影响中西文化强弱的关键因素,虽有夸大之嫌,但也不无道理。 (据《北京日报》)

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1年8月,为组织领导、运筹谋划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书记部通过了解、分析“工运”的现状和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召开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建立劳动团体联合战线、密切各地工人组织之间关系,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922年4月11日,书记部在《民国日报》上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人团体代表1922年5月1日在广州报到:“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本书记部认为有举行必要,特拟定宗旨及办法列下……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通告发出后,立即得到各地工人团体的积极响应,5月24日的《民国日报》发消息说:“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竟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各处派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160余人,代表工人30余万。”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10多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有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等共173人,中共代表有李启汉、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备受拥戴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近百件,经审查委员会整理归纳、评议审核,最后讨论表决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件提案。其中最受关注、最重要的6件均是中共代表提出来的,充分表明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意愿、主张的赞同和支持,也让共产党人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据《人民政协报》)

拾遗

沈从文： 五毛钱的购书券燃起写作谋生的希望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辗转到京城开始了艰难的“北漂”生活。他租住在破旧发霉的小屋里,一边在大学当旁听生,一边写文章四处投稿。但沈从文寄出的文章如石沉大海,到后来他连吃饭都成问题。绝望中,他给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接信来到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看他。见沈从文在冬天还身着单衣,郁达夫便将自己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披在沈从文身上,又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顿饭,还将剩下的3块钱留给了沈从文。这才暂时解决了沈从文的生存之虞。

1924年12月,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在《晨报》刊出,并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五毛钱的购书券。沈从文本来已经打算年底去做学徒,这下看到了以写作谋生的可能性。此后,沈从文接连出版了几本小说集,获取了丰厚的稿酬,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到20世纪30年代更是以其代表作《边城》轰动文坛。 (据《天津日报》)

“唯唯诺诺” 原是古人应答的声音

“唯唯诺诺”这个成语的意思,各种成语辞典的解释都是:顺从而无所违逆。与“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等成语词义相近。但是“唯唯诺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各种辞典都没有解释这个成语的语源。原来,这个成语所反映出来的,乃是古代男子对尊长呼召而应答的两种声音,即“唯”和“诺”。

《礼记·曲礼上》篇中有这样的规定:“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说:父亲召唤的时候,不可用“诺”来应答;先生召唤的时候,也不可“诺”来应答。父亲和先生召唤的时候,都应该用“唯”来应答,同时要站起身来。

“唯”和“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唯”和“诺”都是应答之辞,但“唯恭于诺”。唐代学者孔颖达则进一步注解说:“古之称唯,则其意急也。”用“唯”来应答,语气短促,就像急着应答父亲和先生的召唤一样。

而“诺”呢,孔颖达注解:“其称诺,则似宽缓骄慢。”用“诺”来应答,语气宽缓,因而显得骄慢。张舜徽先生概括说:“盖应答之声,唯速而礼恭,诺缓而意慢。”事实也正是如此,“诺”一般用于尊对卑的场合,《战国策·赵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触龙向赵太后进言之后,赵太后回答道:“诺,恣君之所使之。”即为明证。

这就是“唯”和“诺”作为应答之辞的区别:唯恭于诺。而“唯唯”“诺诺”连用,可想而知乃是连声应答之辞,更加显得恭敬而顺从。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中,齐王让子虚描述一下楚国大泽的见闻,子虚就用“唯唯”应答,这是臣子表示对国君的极度恭敬和顺从。《史记·商君列传》中则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谚语,“谔谔”是形容直言不讳的样子,针对的是千人连声应答的情形。 (据中国新闻网)

那些长到令人窒息的书名

现代人取名讲究简洁有卖点,17、18世纪的英国人比如笛福和斯威夫特,取的书名都长到令人窒息。《鲁滨孙漂流记》的原名为《在约克出生的海员鲁宾孙·克鲁格有个不可思议的惊人生涯,他是海难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在佛罗罗克河口口的孤岛上奋勇求生,单独地过了二十八年,终于被海盗船救起的详情记,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维科的代表作《新科学》初版时的名称是《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一体系的原则》。

当然现代人也用有长书名标新立异的,比如日本的知名艺术家横尾忠则写过一本书,书名长达日文114个字而创日本书籍书名的长度之最,译成中文是:《如果明白烦恼也是迷茫也是年轻人的特点,那就不必担心。因为大伙儿都是这样长大成人的。我也曾是烦恼和迷茫的天才哟。如果认识到在没有烦恼没有迷茫的地方就没有进步的话,那只要你喜欢工作就什么都可以做。去找吧》。 (据《天津日报》)